

我是“四不像”

——一位北大毕业生的故事

刘邦立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四不像”：一个北大毕业生的故事/刘邦立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0. 1

ISBN 7-80654-059-8

I. 平… II. 刘…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0159 号

I25
L51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薛 亮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陈 炯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75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郁龙余

自从郁秀的《花季·雨季》问世以来，请我作序、撰跋、写书评的，越来越多。我是个好说话的人，但作序等见诸文字的事，不得不慎重。我坚持一条原则：有感则发，不然就婉辞，决不能写些不痛不痒，连自己都不能感动的话去敷衍作者和读者。当然，我更不敢多事，主动去揽活儿。但是，为邦立的这本书写序，却是我自告奋勇揽来的。

上星期，我突然接到邦立从成都打来的长途，说他写了一本书，想寄给我，听听我的意见。昨天早上，我收到了他特快专递寄来的书稿，书名叫《我是“四不像”》，大约有 30 万字。我翻阅了一遍，便萌生了写序的念头。晚上，邦立给我来电话，我就说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邦立说：“我寄稿子给你，就有这个意思，只是想先听听你的修改意见，写序的事还没顾得上说。”

邦立是我北大同一个系的同学。因为不同届，所以在校时并无太多接触。十年前，他在香港工作，我们几位校友设法将他妻子借聘

到深大任教。于是，他和我及我的全家熟了起来。

邦立，直率、爽快、干练，言语风趣、幽默，为人古道热肠，好动感情。接触一多，我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郁英、郁秀对他好感起来，继而渐渐发展到几近崇拜的地步。处于社会转型期，大人和小孩之间出现代沟，已成普遍现象。我的女儿和很多孩子一样，见到父母的同事、同学、朋友唯恐避之不及，让她们叫一声“叔叔”、“阿姨”，就像要割她们舌头似的。邦立实在了不起，他在我的两个女儿面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记得两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他，就没大没小，问这问那。她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与他的姐姐也是双胞胎：“你姐姐比你大几分钟？”“她长得像不像你？”“你是叫她姐还是名字？”邦立每回答一句，姐妹俩就一阵乐，前俯后仰笑出了眼泪。邦立见这一对小姐妹如此天真顽皮，就有心寓教于乐，与她们越谈越投入。慢慢地，在两个孩子心目中邦立的形象越来越好，认为他是一位见识广、性情好、有深度而又童心未泯的长辈。现在她们都长大了，又都留学在外，但还都关心着他的消息。这实在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很感动。

去年5月4日，是北大百年校庆。我在东方学系见到了邦立。由于人多，未能长谈，他只是告诉说生了一场病，现在好了。说得那样轻松、毫不在乎的样子。读了他的书稿，才知道他得的是那样一种可怕的病。他拖着术后不久的身体参加母校百年庆典，带给母校和校友的依然是笑语和欢声，没有丝毫悲伤情绪。

邦立在病中写成的这本书，是对自己毕业三十年来的人生小结。你想知道“黑五类子女”在“文革”中的遭遇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吗？你想知道北大高材生毕业后的坎坷经历吗？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典型，深刻，发人深省。他说：“我这三十年的轨迹是：打入底层——久困深山——设法进城——东撞西碰——一事无成。”这“一事无成”虽有自谦成分，但却又是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1993年起，邦立干了多年的信贷经理。从此，就一直被烦恼纠缠着：“拿着钱不能及时贷出去，烦恼；贷出去不能及时收回本息，还是

烦恼；收回来后不贷出去，更烦恼；再贷出去更不易收回来，倍加烦恼；不得已而打官司，尤其烦恼；打赢了官司还是收不到钱，更是莫名地烦恼！头发烦掉了，胡须烦白了，内伤七情，外感六气，忧思过度，邪气攻心，最终导致气血失调、恶疾缠身！”邦立的这段“烦恼歌”写在《病中的反思》一节中，道出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欠款的比催账的更有理，“黄世仁得向杨白劳下跪”。邦立病倒了，只是个人的不幸；而如果我们国家因大量坏账、呆账而“气血失调”病倒了，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邦立历来“报喜不报忧”，而他在大病之后一改常态，写出了心中最大的忧虑。警惕呀，每一位国民！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前车之鉴难道还少吗？邦立的“烦恼歌”是对金融秩序的警示，是他对社会的忠诚。

作者的名字比汉高祖多了一个“立”字，他常自谑说：多个立没用，怎么也立不起来。纵观邦立这段三十年生涯，他确实不是什么傲然屹立的英雄，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一位平凡百姓。然而，正因为平凡，就像我们经常见面的邻居、同事、熟人，所以他的喜怒哀乐牵着我们的心。原来，我们需要崇拜圣贤之外，还需要互相的关爱。平凡人从平凡人身上能感受更真切的经验，引发更深刻的思考。这是我读《我是“四不像”》后的感觉，相信大家读了此书也会有这种感觉。

1999年3月20日晚

于深大新村寓所

写在书前

时下出书的人非常多，自传，回忆录几乎日有问世。作者不是党政前辈，就是学界名流；不是商界巨子，就是文艺体坛红星。普通公民如我者，为什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就因为我还没有读过一本升斗小民回忆自己在几十年沧桑中所见所闻的书。我想，大家都生活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说不定小人物的经历更能以小见大呢。

刚刚过去的 1998 年，在我个人来讲是十分难忘的。这年初，突然发现我腹部患了肿瘤，很快到医院动了手术。医生开了一张让我

全休半年的出院证明。我在肚皮上添了一个22厘米长的伤口，体重下降了十多公斤后，深感从今以后已是“二次人生”。我想，何不利用病休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前度人生”，写一本回忆自己在几十年中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书，也许会有点意思。

196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我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毕业生。1968年“文革”中被分配到农村。在农村八年，我基本上是在小学里教书。“三中全会”以后，我便成了典型的“学非所用”的知识分子。我也是趁这个机会离开农村，回到大城市的。之后的二十年，当然一切都比在农村好多了，但“学非所用”的状况仍然无法改变。因为我学的这种语言，需要的地方实在太少。我不得不学着去干其他工作（我好歹还有一年多用上了印度尼西亚语，比起我的那些一直与所学专业无缘的同学来，尚要好一点）。我这三十年间的经历颇多变化，其中自然有值得记忆的地方。尤其是近几年的工作经历，更是让我体会到了转型期社会的五花八门，并非形势一派光明。

1998年，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我早已与阔别了30年的老同学们约好，5月4日那天，一定要在魂牵梦绕的校园里重聚。这个夙愿圆满地实现了。百年校庆，百年一遇。尽管那天我在燕园不过逗留了十三个小时。可这三十年离别换来的十三小时又是何等地珍贵！当然值得一记。

1998年，还是我的母亲去世三周年祭。古人丁忧，庐墓三年。三年期满，就算守孝正式结束。可我如今对母亲的思念，却是有增无已。病中怀旧，最忆的便是我九泉之下的母亲，所以我也要写出对母亲的怀念。

三十年已一晃而过，当年的天真学子如今已鬓霜背驼，青春不再。三十年中，我做過兵士，当过教师，任过翻译，还忝为什么“经理”。结果是一事无成，半生烦恼。我们这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际遇

第一章

芦荡八百天

1. 夹着尾巴赴军垦

1968年9月5日早晨，北京火车站一个比较次要的月台上，静静地停着一趟列车。月台上除了一幅不大的红底白字写着“欢送外语毕业生赴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字样的横幅外，没有锣鼓，没有大喇叭，没有手执红绸、又唱又跳的红卫兵或工宣队，

更没有欢送仪式、讲话和口号声。总之，那个“火红的”年代惯有的宣传手段和喧嚣的气氛几乎都没有。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同系同学、同校学外语的其它系的同学，还有从古巴回来的学西班牙语留学生，从欧洲回来的学法语、英语和别的什么语的留学生，背着简单的行李，默默地走进火车车厢。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徐徐起动，向河北唐山方向奔去。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已进入“斗、批、改”的“改”阶段，也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旧教育制度”了。尽管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大谈“红卫兵和革命小将是斗批改的主力军”，然而“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们心里都明白，已经没有自己的“戏”了。所以大家口头上也谈“斗、批、改”，实际上做的是“斗、批、散”，“斗、批、走”的思想准备。

走，朝哪儿走？路线已经定了：“四个面向”。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当时只有四个——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学农的，不消说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工的，到工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学医的、学师范的，都将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或参加“六·二六”医疗队，或教马背小学，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惟独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怎么“四个面向”呢？

本来，按照当时的思潮，管你是学什么的，一古脑儿轰下去就是了，又省事，又符合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学生物化学的研究生分配到人民公社供销社卖酱油、学西方哲学的本科生分配到深山林场当会计的例子，我们已经听了不少了。你学外语的有什么了不起，留过洋，讲得来西班牙语又有什么稀罕？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还找不到地方安下你西班牙这颗“牙”吗？西班牙“牙”可以安下，葡萄“牙”，印度尼西“牙”，还有别的什

么“牙”，统统都可以安下。反正一个月四百几十大毛，一个子儿也不少给你，已经够意思了，你还要怎么样？

不过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些颇具远见的领导层人士却没有这么看。他们深知，这一批二十出头，学了几年外语的大学生，无论是在国内学的，还是留洋归来的，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如果像撒花椒面儿那样撒到深山里、草原上，一旦国家需要，要找回来就难了。人也许还找得回来，外语荒废了，那还有什么用？所以，周总理才苦心孤诣，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顶住极“左”思潮，让外交部教育司把这批外语毕业生“包”了下来，统统送到军垦农场去“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再教育”，实际上是储藏起来。外交部选的是离京、津、沪、穗不太远的军垦农场，据说周总理还特别打招呼要部队在劳动之余给这批大学生安排一定的复习外语的时间。按周总理当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搞个三几年也该差不多了。让这批学生到农场去躲它一年半载，时机一成熟，再分配到恰当的、人尽其才的工作岗位上去。

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有一部分也到军队农场去“锻炼”过，但都是分配了具体的单位，至少是具体的地区、县份后才去的。像我们这样不确定以后到何处工作，先“一锅端”到军垦农场再说的，还没有听说过。

周恩来总理的良苦用心在“四个面向”气氛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所以下农场显得非常低调、非常冷清，与数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场面完全不能比，大家都有点“夹着尾巴”的味道。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讲，“夹着尾巴”四个字就更有其深意存焉。

我是个心直口快、胸无城府的人，1962年，我从家乡四川成都考入北大。大学几年，春风得意，言谈举止间难免有得罪同学的地方。如果在风平浪静的年代，同学们也许不会计较什么。可

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来，人人都像吃了弹药枪药似的，什么东西都要“上纲上线”，巴不得自己身边随时都能挖出一个小赫鲁晓夫来。我出身“反动家庭”，平常说话又不检点，加上还有写日记的臭毛病，在别人眼中，天知道是不是在记“变天账”！1967年“反‘二月逆流’”之后，北大刮起一股揪反动学生的风。校园里三天两头都有“把反动学生×××揪出来示众”的大标语、大字报出现。根据呢？无非是日记本里断章取义地摘几句、私人信件里捕风捉影地挑几段，把被揪的同学描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而已。

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4月里的一个夜晚，趁我不在寝室里的时候，几位同班同学突然撬开我的书桌，抄走了我的几本日记，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当时，对一个人进行搜查、隔离、批斗，是不需要报什么主管部门批准的，“革命群众”认为可以怎么干就怎么干，理由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两天之后，《且看反动学生刘邦立的丑恶嘴脸》的大字报便贴在宿舍楼的墙外。可能是因为大字报中所列的我的“罪行”还不够水准吧，这份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久而久之，我和同学们又处得比较融洽了，大家在一起也不提这件事。只是我不敢再写日记，也不敢见到什么就又评头论足了。到了1968年9月份，下军垦农场的日子临近了。我舍不得我那几本记录下自己大学生活的日记，就跑到系里找一个掌握了点实权的青年教员（1967年他也参与了对我的批判），想讨回我的日记。没想到他竟虎着脸对我说：“你以为你的事就完事了吗？没那么便宜！我们是按毛主席‘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和‘给出路’的政策，才让你和大家一起下农场的！你下去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改造，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争取解放军从宽处理你的问题——你的材料，我们已经转给解放军了！”

一阵的连唬带哄，吓得我只好“夹着尾巴”到军垦农场去了。

2. “大学”藏在芦苇中

我们乘火车在唐山车站下了车，又转乘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将要在哪儿“战天斗地”的地方——北京军区×××部队农场。

这地方属河北唐山地区丰南县地界，在渤海之滨，小地名叫“草泊”。草泊，顾名思义，原是一大片芦苇荡。若干年前，一支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部队开到这里，在茫茫芦苇中选出一块块较干较平的地方，砍掉芦苇，开出沟渠，引来百里外的滦河水，把



摄于农场的电动脱粒机前。
1969年秋，我到唐山草泊军垦农场一周年时，

6 我是“四不像”

一片盐碱滩改造成了水稻田。我们到达的时候，在南方早已过了开镰割稻的季节。可这儿的稻田还是一片绿色，稻穗正在灌浆呢。

部队对我们还是满客气的。师、团、营首长都到唐山火车站欢迎我们。我们从北京出发前，已经按军事化编制编成了连、排、班。这儿的部队是按营分驻的。一个营插一个学生连。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和各班班长都由现役军人担任。我所在的学生连的连长原是三营七连的副连长，他从车站直接把我们带到三营的驻地，是乘军用卡车一直开到营房边的。从此我们的番号就是“××××部队三营学生连”了。

三营的驻地是一块狭长的高地，每个连占南北长约七八十米，东西宽约二十来米的一条地带。各连旁边都有一个长长的鱼塘。房子是土坯作墙、芦苇和高粱秆作顶的平房。后来才弄清，鱼塘是取土打坯后留下的坑，灌上水便成了鱼塘，既可养鱼，也是连与连之间的“界线”。

三营学生连共三个排，一、二排是男生，三排是女生。每个排住一栋土坯房，实际是一个南北各有一溜通铺的大房子，三四十副被褥紧挨着把通铺排得满满当当的。全连一百多名战士，北大东方语言系和西方语言系的学生约占一半，从古巴回来的学西班牙语的留学生约占一半。另外还有十几位在朝鲜学朝语，在越南学越语，在柬埔寨学柬语，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学阿拉伯语的留学生。北大的学生中，有学印尼语、泰语、印地语、越南语的，有学日语、阿拉伯语的，有学梵语、巴利语的，还有学英语、德语的。一百来号人的连队集中了十多个语种的大学生，涉及的国家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简直是一个小型的外国语大学了。

3. 第一笔工资

按照当时分配我们这批学生的权威文件《国发(68)92号文件》(即国务院1968年发出的第92号“红头文件”),我们应“从七月份起享受大学毕业生待遇”,即从七月份起领工资,从七月份起计算工龄。因此,九月份到农场后发下的第一笔工资,就是7、8、9三个月的,一共是一百二十多元。我活了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一下子有这么多钱的时候,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突然成了“富翁”。大部分同学也都是这样,手里捏着厚厚一叠钞票(当时人民币最大面额是十元),激动得不知怎么办。可我“富翁”只当了几小时,就请假到团部邮电所去把钱寄走了几乎一半——六十元。

这钱既不是寄给母亲,更不是寄给妻儿——我那时还是光棍一条,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而是寄给在上海的表舅,我母亲的一位表哥。这是为什么呢?

我父亲死得早,我刚上大学那时,家里的收入只有母亲每月三十多元工资。她除自己吃饭,还要供养我和我姐姐,根本是入不敷出。学校每月给我发十二元五角的助学金,我母亲每月寄五元钱给我,我一月一共有十七元五角的生活费,也就够用了。因为那时念大学,一不收学费,二不收杂费,住宿、水电都免费,无论发多少讲义,一学期也只收一元钱的讲义费,真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到了1965年,我母亲的月工资增加到四十多元,姐姐也到云南支边去了。我感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许多同学还要好些了,就主动提出放弃了每月十二元五角的助学金(那时大家都在学雷锋,都很自觉。别人如果家庭经济状况出现了好转,也会主动放弃助

学金的)。我妈每月寄二十元给我，我吃饭花十五元，还有五元作零用。

没想到“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我妈在单位上就被“揪出来”了。1967年，“革命群众”更把她的工资也停了，每月只发十八元生活费。她自然再也无法按月寄二十元给我。怎么办呢？这时再去申请助学金？根本不可能！眼看我吃饭就要成问题，我妈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远在上海的表舅求告，希望表舅每月寄二十元给我，直到我参加工作。表舅是高级知识分子，统战对象，虽然也免不了受些冲击，大约每月的工资还没降。表舅见到远在家乡的表妹如此窘迫，就按月从上海寄二十元给我。这样持续了三个月，我妈单位的“革命群众”大概突然把毛主席“讲政策，给出路”的指示学透了，又恢复了她的工资。我妈就赶紧通知我表舅不要再寄钱给我，仍由她每月寄给我二十元。

表舅虽然一再表示那三个月寄给我的钱是资助我的，可我总感到是欠了他老人家一笔债——既是钱债，也是情债。情债不好还，钱债呢，我既然已经自立，就不能再欠。所以一领到工资，就首先给表舅寄了六十元去，还写了一封发自内心的感谢信，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雪中送炭。

三十年过去了，母亲已经作古，表舅仍健在。前些年我到上海去，见到表舅，提起这事，他还直说我“太认真”。

第一笔工资还有六十多元，交了当月的伙食费十五元，又花了十二元钱买了一双半高腰雨靴。农场的道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雨靴是少不得的装备。因为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为自己添置的日用品，所以我特别爱惜它。加上这双天津生产的耐酸碱雨靴质量确实好，三十年了，既没裂口，也没老化，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有时下大雨，我还要穿上这双“老古董”出去踩踩水。

4. 朱毛的老乡

学生连虽然是由学生组成，连、排两级的领导，包括司务长，可都是真正的军官。初期甚至班长也是解放军派老兵（大都在部队当过班长或副班长的）来充任，副班长才由学生当。至于谁当，部队根据各人的档案，自然是选的出身好，“根正苗红”的同学。大约过了一年，部队才把班长都撤走了，从此正副班长都由学生自己当。但连长、指导员、司务长、排长，却是一直由军人担任，直到我们离开农场，学生连结束为止。

我们那个连的连长姓黄，三十出头，黄脸皮，小个子。大概因为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乡人，感到很骄傲吧，他讲话带一口浓重的湖南腔，一点不改。他本来已经确定要转业回乡了，部队突然决定要组建学生连，就把他留下来管我们，官衔也升了半格，由副连长而成为正连长。这样他又多穿了两年多军装。我们离开农场后，他也立即转业了。黄连长大概一入伍就当上了水稻兵，对育秧、耙地、放水、薅草等一整套大田农活都很在行。

指导员姓刘，身板结实，脸膛黑红，一对不大的眼睛透出一股精明劲儿，一望而知是四川人。一问，果然是四川仪陇县的。我想奉承他一下，说“您跟朱老总是老乡啦！”谁知他反而不高兴了：“是啊，都知道我和‘老右倾’是家乡人！”原来那年月朱德元帅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而遭“永远开除出党”的厄运，可也在社会上被不点名地说成“老右倾”、“一贯反对毛主席”、“井岗山根本不是他带队伍去与毛主席会师的，是林副统帅带去的”等等。所以指导员从不主动说自己是四川仪陇人，讲话也尽量不带川腔，而是发普通话的口音操“半钢椒盐普通话”，与连长的风格完全不同。指导员是汽车兵出身，到过朝鲜，回国后又长期